

澳门在早期跨国茶叶贸易及 茶文化传播中的门户角色

袁绍珊

内容提要 在中国商品出口史上，茶叶贸易曾占有十分重要的比重，南方一隅的澳门面积虽小，在 16–19 世纪中国茶叶转口贸易中的地位却相当显赫。本文透过对访澳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茶文化记录、澳门早期印刷品中的出口茶叶种类与国际贸易纠纷事件、澳门相关的茶叶外交，以及对以澳门为始发点的茶种、茶农、茶叶种植技术的国际输出等方面的史料梳理，论证了澳门作为 16–18 世纪跨国茶叶贸易的门户角色，印证了澳门对海上茶叶之路的繁荣和茶文化国际化的特殊贡献。

关键词 澳门 茶叶贸易 茶文化传播 传教士

澳门虽为弹丸之地，却有着四百多年转销中国茶叶到西方国家的历史。作为远东最早的茶叶转口贸易港之一，澳门在16–18世纪的跨国茶叶贸易及茶文化传播中担当着举足轻重的门户角色。

一 16–17世纪访澳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茶文化

1533年，葡萄牙人抵达澳门，继而租居，开始接触中国的饮茶风俗，澳门遂成西方人认识茶文化的最早窗口之一。部分西方海员带回小量茶叶馈赠欧洲亲友，但尚未意识到中国茶的跨国贸易潜力。陆续抵澳的欧洲传教士，在澳学习汉语及传教的同时，对中国茶文化尤其好奇，他们记录在澳见闻并加以出版，逐步加深了欧洲人对中国茶文化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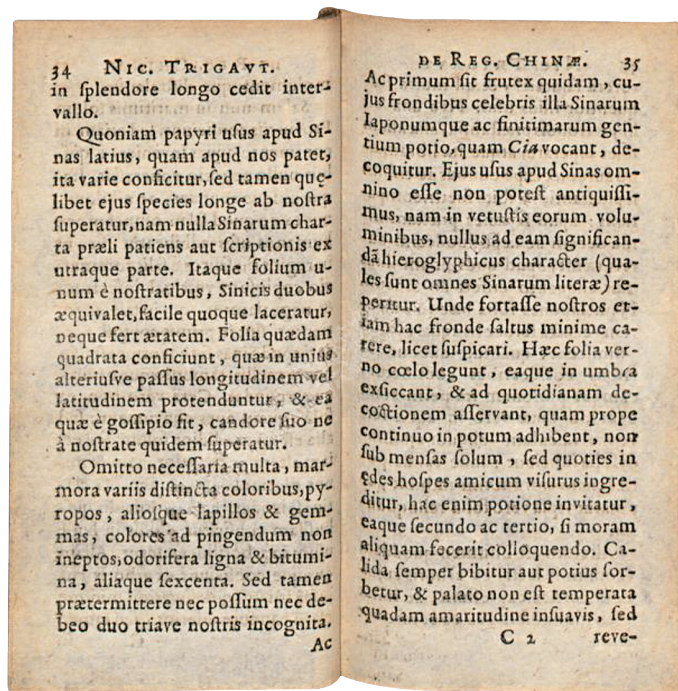
据金国平研究，从现有材料可见，首次向欧洲介绍中国饮茶风俗的人应为葡萄牙多明我会会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 1520–1570)。克鲁斯于1556年经澳门前往广州，并在沿海一带游历数月，搜集并了解中国民情。他于1569年回国后，把所见所闻撰写成《中国事务及其特点详论》，其中即有对中国饮茶习俗的描写：“如果有人或有数人造访任何一个体面人家，习惯向客人献上一种他们称之为茶(cha)的热水。它装在瓷杯里，放在一个精致的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水微呈红色(vermelha)，药味很重。他们经常饮用，系用一种略带苦味的草熬制而成。他们通常用它来招待所有

不管熟悉与否的贵客。他们也多次请我饮用它。”^①

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把1582年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的日记翻译成拉丁文,并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此书传世原版极少,澳门公共图书馆议事亭藏书楼藏有1639年版[图一],其中有对于中国茶的详细描述:“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Cia)的那种著名饮料。中国人饮用它为期不会很久,因为在他们的古书中没有表示这种特殊饮料的名字,而他们的书写符号都是很古老的。的确,也可能同样的植物会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发现。在这里,他们在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阴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这种灌木叶子分不同等级,按质量可卖一个、两个甚至是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可卖到十个,甚至是十二个金锭一磅。日本人用这种叶子调制饮料的方式与中国人略有不同。他们把它磨成粉末,然后放两三汤匙的粉末到一壶滚开的水里,喝这样冲出来的饮料。中国人则把干叶子放入一壶滚开水里,当叶子中的精华被泡出来以后,就把叶子滤出,喝剩下的水。”^②

曾于澳门圣保禄学院学习、最终病逝澳门的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在1602年的书简中也有对中国的喝茶文化相近的描述:“落座后,主人家端上一种叫做茶(cha)的饮料,是用开水冲泡的一种深受中国人喜爱的叶子。上茶是必不可少的礼节,否则主人被当成礼数不周或有失恭敬。通常上两、三道茶,其间,主人家端上一些水果和甜点,配上取食用的勺子。”^③

〔图一〕《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
澳门公共图书馆议事亭藏书楼藏
采自澳门公共图书馆数字化馆藏资料库



① Gaspar da Cruz, *Tractado em que se Cõtam Muito por Est so as Cousas de China, cõ Suas 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yno Dormuz, etc.*, Euora: Andre de Burgos, 1569, Cap.13, Sem Paginação. 转引自金国平《澳门——葡萄牙语“茶文化”之发祥地》,《澳门研究》2017年第1期,第25页。

②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Matteo Ricci, Nicolas Trigault, *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 澳门公共图书馆议事亭藏书楼藏,1639年,拉丁文原文第35页。

③ 叶农整理,金国平、罗慧玲、蒋薇译《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25页。

利玛窦和庞迪我对中国茶的描述，虽然仍有误解，但可见其时欧洲人对亚洲茶叶的认知已大为进步，大致掌握了中国及日本关于茶叶的冲泡过程、用量、用具、饮用方式、售价等。

利玛窦以及1579年抵澳的意大利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被一些学者认为是17世纪的中文手稿《拜客训示》最初的作者之一，部分对话也可能出自1593年来澳、后随利玛窦往北京且长居杭州的意大利会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¹¹。

《拜客训示》记录了其时在中国的西方耶稣会士的日常行为，如知道“前日人送来的是雨前茶、松萝茶，与家里买的龙井茶、天池茶，都是细茶”，吩咐茶房只供“好客”使用，平日只用“粗茶”便可；且配有“茶果”(如梭子葡萄干、瓜仁薄荷、牛皮糖、香圆片、梨糕、鸡蛋糕、卷饼、懒人饼)，以及不同等级的“茶泡”(以松子、榛子、杏仁、瓜仁招待上等客人；以葡萄、白果、烘豆、莲肉、枣儿、栗子招待平常客人)¹²。可见在华耶稣会士对饮用中国茶已十分讲究，接待客人具有等级观念，接待所用茶的品质、茶具(茶钟、茶匙、茶盘)的精致程度、果类依据客人之地位有所不同。

二 澳门作为早期跨国茶贸易的重要门户

葡萄牙人在16世纪中叶开始以澳门为贸易据点，陆续开辟了多条东西方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包括“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西哥—巴西”“广州—澳门—长崎”等，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得风气之先的澳门，成为远东地区最早的国际贸易中心，并因此逐步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全球贸易网。

葡萄牙人虽然最早通过澳门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但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把茶叶作为商品大量贩运到欧洲，其时也尚未形成普遍的饮茶习惯。随着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资本势力快速扩张，荷兰人紧随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广州一带，在17世纪初最早把茶叶销至欧洲，荷兰也是欧洲较早兴起饮茶风尚的国家。

1597年，荷兰人在爪哇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商站，以此作为向中国进行贸易的基地。160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1607年，荷兰商人从广州购入一批中国绿茶，在澳门装货出港，运至巴达维亚，于1610年辗转运抵阿姆斯特丹销售，开启了“广州—澳门—巴达维亚—荷兰”茶叶贸易的序幕¹³。《茶叶全书》中的《荷兰茶叶贸易史》称：“茶叶成为欧洲人之正常商品，乃始于1637年荷兰公司之十七董

〈1〉 参见[日]内田庆市(Uchida Keiichi)《有关〈拜客问答〉的若干问题及其他》，《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10号，2017年，第87—100页；李毓中、张巍译《“洋老爷”的一天：从〈拜客训示〉看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清华学报》2016年第1期，第77—119页。

〈2〉 参见李毓中、张正彦、赖彦尘、吕子肇、杨雅竣、叶臻、张巍译《〈拜客训示〉点校并加注》，《季风亚洲研究》总第1卷第1期，2015年，第133—167页。

〈3〉 另一说法是荷兰商人将从澳门与日本平户收购的绿茶，运至爪哇岛西端的万丹(Bantam)集中，再转运到荷兰海牙(Den Haag)，进而带入欧洲。

事上书于巴达维亚总督之时，呈文内称，茶叶已开始为人民所需要，吾人希望每艘船均装有若干箱中国茶或日本茶。”¹ 荷兰人把这些中国茶叶经澳门运到阿姆斯特丹后，除一部分出售给荷兰当地人外，大多数转销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从中赚取巨大利润。

首位来澳的法国人、耶稣会士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 1593—1660)，曾在澳门布道十二年之久。他在巴黎1653年出版的《罗历山在中国及东方其他国家旅行及传教记》中，提及了中国茶叶的好处：“在我看来，促使这个民族健康长寿的东西之一就是茶叶。它的使用在东方非常普遍。我们在法国就从荷兰人那里开始了解茶叶。他们把茶叶从中国运来，以每磅三十法郎的价格在巴黎出售，而他们在那个国家购买这种东西的价格仅为八至十法郎。”²

到18世纪初，荷兰成为中国茶的最大贸易国。荷兰商人其时在澳门的贸易活动十分频繁。索萨(G. B. Souza)称，1676年和1678年到万丹来的船中，有2艘澳门船运来茶叶共12664磅，相当于英国东印度公司1667至1672年五年间从中国进口茶叶的两倍³。康熙二十九年(1690—1719)，澳门每年运往巴达维亚的茶叶达到500—600担⁴。其时澳门运至巴达维亚贸易的货物主要为茶叶，而回程则装载大量胡椒，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换。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英国在爪哇万丹设立万丹东印度公司，旅居于此的英国人和海员受当地华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影响，也开始饮用中国茶，并将中国茶带回英国赠送亲友，英国饮茶由此慢慢传播开来。目前所见关于英人购买中国茶叶的最早记载，亦与澳门息息相关。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Hirado)代表理查德·韦克翰(Richard Wickham)1615年6月27日致公司驻澳门的代理人威廉·伊顿(William Eaton)信函(图二)云：“伊顿先生，我想请您帮我买一罐澳门最好的茶(chaw)，两副美丽的弓箭，半打方形的、用来放烟草的澳门镀金盒子，一切费用我均愿负担。”⁵可见在1615年甚至更早之前，英人已对中国茶叶有所认知，且知道其时的澳门是上等茶叶的重要通路，而英人视中国茶叶为珍贵的物品而不是日常口粮，不惜高价托友人代为搜罗。

英国兴起饮茶亦与葡萄牙凯萨琳公主(Catherine of Braganza)酷爱饮用中国红茶有关。1662年，凯萨

〈1〉 [美]威廉·乌克斯(William H. Ukers)《茶叶全书》(下册)，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第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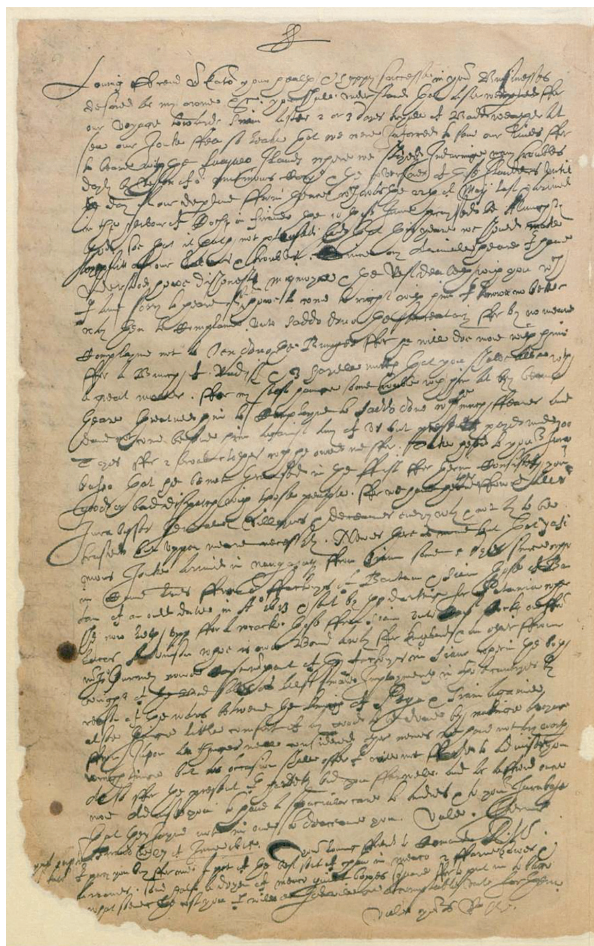
〈2〉 Alexandre de Rhodes, *Voyages et Missions du P. Alexandre de Rhod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dited by Auguste Carayon, Paris: Julien, Lanier et Cie. Editeurs, p.61. 中译版参见[葡]苏一扬(Ivo Carneiro de Sousa)著，张廷茂译《耶稣会士罗历山：第一个在澳门的法国人》，《文化杂志》2014年总第93期，第93页。

〈3〉 G.B.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1. pp.140-141, p.160.

〈4〉 邓开颂、吴志良、陆晓敏主编《粤澳关系史》，中国书店，1999年，第181页。

〈5〉 “Mr Eaton, I pray you buy for me a pot of the best sort of chaw in Meaco [Macao], 2 farre [fair] bowes & arrowes, some half a dozen of Meaco guilt [gilt] boxes, square, for to put in tobacco. and whatsoever they cost you, I will be alsoe willinge acoumptable unto for them.” *Richard Wickham at Hirado to William Eaton at Kyoto, June 27, 1615*, IOR/G/12/15, p.16; 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4*,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1, p.296.

〔图二〕理查德·韦克翰 (Richard Wickham) 致威廉·伊顿 (William Eaton) 信函 (局部) 1615 年 6 月 27 日
大英图书馆藏
采自东印度公司电子资料库
https://www.eastindiacompany.amdigital.co.uk



琳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二世 (Charles II) 时的嫁妆, 包括200万枚金币 (澳门负责部分献金), 还有不少葡萄牙海上船队从各地搜罗来的奢侈品, 包括亚洲的香料、印度的特产和美洲的食糖, 当中更有一套中国景德镇青花瓷茶具, 和221磅中国星村桐木关红茶。凯萨琳公主被誉为“饮茶王后”, 她在宫中积极提倡皇室饮用中国茶, 把饮茶的潮流带到英国上流社会。1664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用4镑5先令购买了2盎司中国茶叶进献给英皇查理二世^{〔1〕}, 说明当时的中国茶在英国是珍稀的奢侈品。饮茶风气在英国盛行以后, 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84年在澳门南湾开设办事处, 经营茶叶等货品贸易。

中国的茶叶外销, 最初都由外商在广州购入, 经澳门运销到欧洲、亚洲乃至美洲各国, 18世纪初开始有华商参与国际茶叶贸易, 同样经澳门出口。1871年, 澳门运往香港的茶叶有14511担, 价值392877元; 1872年增至24972担, 价值686730元。此外, 澳门用远洋轮船直接运到欧洲的茶叶, 1871年有19299担, 价值443877元; 1872年增至21927担, 价值504321元^{〔2〕}。虽然近代广州的总体出口贸易量远远大于澳门〔图三〕, 但19世纪的澳门已经不再是依附于广州的外港, 和广州有着货品种类分流与商业竞争的关系〔图四〕。直到1884年, “由于自澳门出口

经常能卖得好价”, 许多茶商依然选择将茶叶从广州运往澳门出口, 致使19世纪下半叶广州的茶叶国际出口贸易量逐年减少^{〔3〕}。

与此同时, 随着1841年香港开埠, 香港渐渐取代澳门的国际贸易港地位。1865年从澳门出港的船只, 已从30年前的1000次下降到206次, 贸易几乎仅限于进口鸦片7500箱 (价值1631万法郎) 和出口茶叶

〔1〕 [美] 马士 (H. B. Morse) 著, 区宗华译, 林树惠校, 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1634—1834 年)》第一卷,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年。

〔2〕 以上货币单位均为银元。详见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等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 第43、255、283、76、79、95、286页。

〔3〕 参见莫世祥《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第173—186页。

(340万法郎)^{〔1〕}。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十一日及八月初一日,《知新报》刊登“澳门”一文,其中载有澳门当时的情况:“澳门向为繁盛之区,商贾辐凑。自香港既辟以后,商务渐衰……商务以茶叶出口为大宗,每年值银70万元;各款花油及鸦片等物,颇为畅销。”可见澳门的国际茶叶贸易的门户角色,虽然在19世纪已被中国其他口岸取代,但茶叶出口依然是其时澳门最主要的经济命脉之一。

三 澳门出口茶叶种类与国际贸易纠纷

明清以来,欧洲对茶叶需求剧增。我国各产茶地兴起了生产加工外销茶的热潮,不少茶商亲自到内地茶区收购茶叶。据清嘉庆五年(1800)的记录,其时总面积约11.6平方公里、总人口约三万人的澳门,却有16家制茶作坊,1000多工人,年出口价值达200万葡币^{〔2〕}。

〔图三〕英国画家汤马斯·阿林(Thomas Allom, 1804-1872)绘制的《茶及茶叶装卸》版画印刷品
澳门艺术博物馆藏
澳门艺术博物馆授权使用



〔图四〕澳门南湾景色
华纳·瓦南(Warner Varnham)原作,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绘制,约1843年
呈现了贸易商行林立、繁华热闹、沿岸欧洲风格建筑的南湾港口景色
澳门艺术博物馆藏
澳门艺术博物馆授权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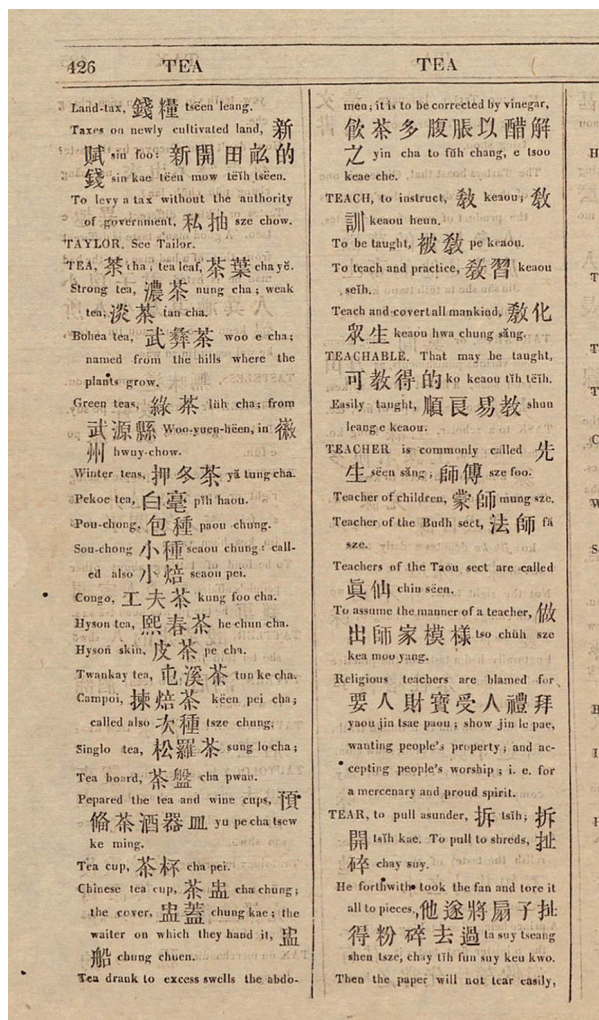


〔1〕 [法]卢德维奇·德·波瓦公爵(Ludovic de Beauvoir)《爪哇、暹罗与广州》第13章,参见[法]德立·龙巴(Denys Lombard)著,李长森译《德·波瓦公爵在澳门,1867年2月》,《文化杂志》1995年总第23期,第11—22页。

〔2〕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19世纪》,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第1—2页。

〔图五〕《英华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局部)

澳门公共图书馆议事亭藏书楼藏
采自澳门公共图书馆数码化馆藏资料库



从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的澳门印刷品推测，当时在澳门外销的茶叶种类相当多。据澳门博物馆藏一份1755年附有拍卖条款的文献，记述了人们正在抢购一批来自澳门的货物。货物列表中，除了多匹丝绸及多条丝缎长裙，还有品类繁多的茶叶，皆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价值连城的商品。

世界上第一本汉英字典《英华字典》(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是1807年来华的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为东印度公司编著，于1822年在澳门由P. P. Thoms印制，现藏于澳门公共图书馆议事亭藏书楼〔图五〕。从《英华字典》的茶叶名称可见，长居澳门、精通汉语的马礼逊对中国茶已有非常精细准确的翻译，如武彝茶(Bohea tea)、绿茶(Green tea)、押冬茶(Winter teas)、白毫(Pekoe tea)、包种(Pou-chong)、小种(Sou-chong)、工夫茶(Congo)、熙春茶(Hyson tea)、皮茶(Hyson skin)、屯溪茶(Twankay tea)、拣焙茶(Campoi)、松罗茶(Singlo tea)，亦足见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茶类之多。该字典部分条目更有产地信息，如“绿茶”一条，即准确标注生产地为徽州武源县。亦有茶盘、茶杯、茶盅、盅盖等茶具的英文翻译，以及化用苏轼在《物类相感志》中“饮茶多腹胀，以醋解之”的古方。

由汉学家兼第二任香港总督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1824年在澳门印制出版的《通商字汇》〔图六〕，关于茶贸易的字汇和体例亦大致和马礼逊的《英华字典》相若。戴维斯在《英华字典》的基础上，在“Tea”的条目下补充了“大茶”(ta-cha)、“正茶”(ching-cha)、“雨前茶”(Young Hyson)、“珠茶”(Gunpowder Tea, choo-cha, Pearl Tea)，以及“茶师”(Tea-inspector)、“茶客”(Tea-merchant)、“茶办”(Tea Muster)等^{〔1〕}。从这两本重要字典可见，19世纪初的澳门在国际茶叶贸易中虽然已不再独领风潮，但由于中西译介和出版印刷等条件的相对成熟，对国际茶叶贸易的实务知识和茶文化的传播依然起重要作用。

国际茶叶贸易的增加，亦不免伴随商业纠纷，如婺源县商人王邦达代销茶叶与荷兰大班范花臣之金

〔1〕 John Francis Davis, A Commercial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 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 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e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Hong Merchants, & c. & c.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 Macao, China: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Company's Press, by P. P. Thoms, 1824, p.69

钱争执。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2月3日),王邦达替澳门外江茶客源泉号代销茶叶,他与澳门葡人路列(Luné)相识,而路列又与荷兰大班范花臣(J. Senn van Basel,又作凡花臣、番巴臣)相识,故将茶叶1360箱全数售予范花臣,拟价银为12000余元,双方立约,并由葡人路列和兰叻(Lançao)签名为证。但卖方交齐茶货后,买方仅交银3000元,所欠款项,双方纠葛不清。王邦达年已70岁,在澳门贸易已达46年,熟知澳门的议事规则,故呈词至澳门理事官,要求澳门王室大法官批准并追还欠款^①。澳门其时相对完善的国际贸易仲裁制度及法规,亦是吸引外商在澳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之一。

四 茶以怀柔与制夷:澳门相关的茶外交

茶叶、瓷器、丝绸皆为明清时代澳门的主要出口货品,茶叶贸易在中西交往中尤为举足轻重,如清赵翼《檐曝杂记》所言:“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②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九日(1814年11月30日),两广总督蒋攸钰等上疏:“查南洋诸夷,以暎咭喇为最强,而并非富饶。惟借贸易为资生之计,其货物不到内地,亦别无销售之处,且呢羽、钟表,中华尽可不需;茶叶、土丝,彼国断不可少,是其不能不仰给于贸易者,其理易明。惟是怀柔驾驭,必当杜渐防微。”^③据道光《香山县志》述英商居澳事称:“暎咭喇……贸易以粤东为大。尤重中国茶,数日无茶即瞽。”^④鸦片战争前,中国士大夫多以茶叶、大黄为中国所产,又为西人所必需,故被视为“制夷”之工具。

清政府及澳葡政府就增加内地对澳的出口茶叶供应、减出口茶叶税等议题上的多番角力,亦是茶以怀柔与制夷的外交手段的反映。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12月27日),清政府应澳门议会的要求,同

〔图六〕《通商字汇》(局部)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采自哈佛大学图书馆电子化公开文献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hvd.32044086540952&seq=1>



① 《监生王邦达为与荷兰领事凡花臣交易银钱纠葛事呈理事官师爷禀》,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684页。

② (清)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0—21页。

③ 《两广总督蒋攸钰等奏陈夷商贸易情形及酌筹整饬洋行事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④ (清)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第215页。

意增加对澳门的茶叶供应¹。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2月18日), 澳门议事会理事官埃斯特旺·卡内罗(Bernardo Estêvão Carneiro)致函广州海关署, 抱怨朝廷下旨后, 人们停止了鸦片易货贸易, 加上官府设置障碍, 致使广州出口到澳门的茶叶减少。卡内罗请求放宽茶叶出口到澳门的限制, 不要人为阻挠。又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5月30日), 葡国政府发来示谕:“嗣后所有茶叶由澳门直往西洋各港口, 悉照本国沿海生意一体办理, 其税项每100元恩减银25元。”²葡萄牙透过减低澳门出口茶叶税, 以增加澳门在茶叶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清代皇帝对从澳门来京的外国使团, 也多以茶叶为外交礼物。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5月1日), 葡萄牙巴哲格使团进京。4日, 乾隆帝接见了使团人员, 刘松龄神父充任翻译。5日, 乾隆帝下令升刘松龄神父官至三品, 表彰他接送葡萄牙使臣由澳门入京有功。11日, 乾隆帝在圆明园设宴款待使团人员, 并向葡萄牙国王回赠了大量丝绸织品和精美的瓷器漆器, 赏巴哲格大使各色纱、葛布、瓷器、折扇、纸、墨、茶等物品, 其后另又随敕书赏葡国国王各色纱、葛布、扇、香袋、茶叶、糕点等³。

清嘉庆八年(1803), 据香山知县许乃来禀, 澳门葡人富商噶威·味先叻(Manuel Vicente)将一头小象赠送给两广总督吉庆, 吉庆以清朝封疆之吏不能收受外夷之物而拒绝, 并回赠水果四样、茶叶四匣、绣子四匹⁴。清嘉庆九年(1804年5月31日), 香山知县金毓奇下澳门理事官俾利喇谕, 犒赏协助捕获海盜的澳门葡萄牙船, 发来猪、羊、茶叶、橘饼等物分赉西洋船收领⁵。1839年9月3日, 两广总督林则徐巡视澳门, 和澳葡政府代表交涉之时, 礼品中亦少不了茶叶:“……在庙中传见夷目, 与之语, 使通事传谕, 即颁赏夷官色绶、折扇、茶叶、冰糖四物。夷兵牛羊酒面, 并洋银四百枚。”⁶可见茶叶亦用作涉外回礼或犒赏洋人之用。

五 从澳门出发: 茶种、茶农、茶叶种植技术的国际输出

葡萄牙除了在国际茶贸易上试图突破荷、英的主导地位, 也另辟蹊径, 以澳门为基地及出发点, 向

〈1〉 前揭[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著, 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 19世纪》, 第74页。

〈2〉 《澳门政府宪报》1889年6月1日第22号附报。

〈3〉 《巴哲格大使敬呈唐·若泽一世国王报告1752年出使京廷记》, 载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 澳门: 澳门基金会, 2000年, 第219—231页;《明清史料》庚编第八本《赏葡萄牙国王及其贡使物品礼单》, 转引自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 第137页。

〈4〉 《两广总督奏报澳夷噶威味先叻欲将小象一只送省未收酌赏水果等物片》, 前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二), 第158页。原档无时间, 但许乃来出任香山知县在1799至1803年, 故暂附于此。

〈5〉 《香山知县金毓奇为犒赏获盗番船事下理事官谕》, 前揭刘芳辑, 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 第484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613页。

葡属殖民地输出茶种、茶农及茶叶种植技术。1807年起，葡萄牙王室为逃避欧洲拿破仑战争迁往巴西，里约热内卢遂成葡萄牙的政治中心，急需开源以支持庞大支出。有感于茶贸易的庞大利润和国际需求，在巴西的葡萄牙王室锐意发展茶叶种植。

1811年，摄政王唐·若奥颁发特许令，兴建里约热内卢植物园(Jardim Botânico)。翌年，澳门市政议员拉法尔从澳门寄出了大批茶种¹，来自澳门的第一批茶种和经招募赴巴西种茶的约300名中国茶农，被送到该植物园。里约热内卢的圣克鲁斯皇家农场(Fazenda Santa Cruz)亦引入中国人种茶。

清嘉庆十七年七月初一日(1812年8月7日)，华工石保致澳门铺户南兄等叙述在巴西种茶生活情形的书信(嘉庆十七年七月姆路架然那路娘娘花园吉日封寄)[图七]，已提及华工在巴西“所种要唐山细茶”，以及茶树、茶籽及制茶工具不足等开拓之艰：“弟前岁粮兄台手上，头路西洋，往去种茶生理。到兵头埠，茶树十余条，细茶仁种，泥土三块，并无声气。”“做茶家伙物件一无所有。”“寄来茶树两箱，未知钦差大人寄来茶种多少？并无声气。弟所忧虑者，澳门钦差大人及兄台茶种寄来，弟紧用种。弟看泥土，乌泥、黄泥、沙土，水土甚好，风色不好。”²

寄信人石保应为中国内地的专业茶农，经收信人南兄，即在澳门开店的中国人之引介，由判事官眉额带历(Miguel de Arriaga Brumda Silveira)安排，前往里约热内卢种茶。“姆路架然那路”应为华人对里约热内卢(Rio Janeiro)的早期音译。

清嘉庆十七年(1812)，华工亚腾等亦致信澳门铺户南兄[图八]，叙述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情形，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前岁澳门粮国使大人种细茶，往西洋王家花园佣工。……三人开得茶园地一座，落得细茶种，条条可生，国王甚至欢喜。启者连界上下一十余里……兄无烦忧虑矣。……信到店中，烦兄携来老气细茶种，细茶匣不可开孔、不可泄气，不可落藏酒气、雨湿、咸水，时时小心料理，不可失误。又嘉应州锅头十大口、做茶家伙物件样样要紧关。至今澳门钦差大人(按：指澳门理事官)细茶仁甚多，大箱小箱，不知几多。无用细茶种，枉费功劳，枉费心机。千远水路，山遥水远，笔不尽言，谨此达上。”³王家花园即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应和娘娘花园为同一处。信中代笔之石宝，和前述信函中的石保应为同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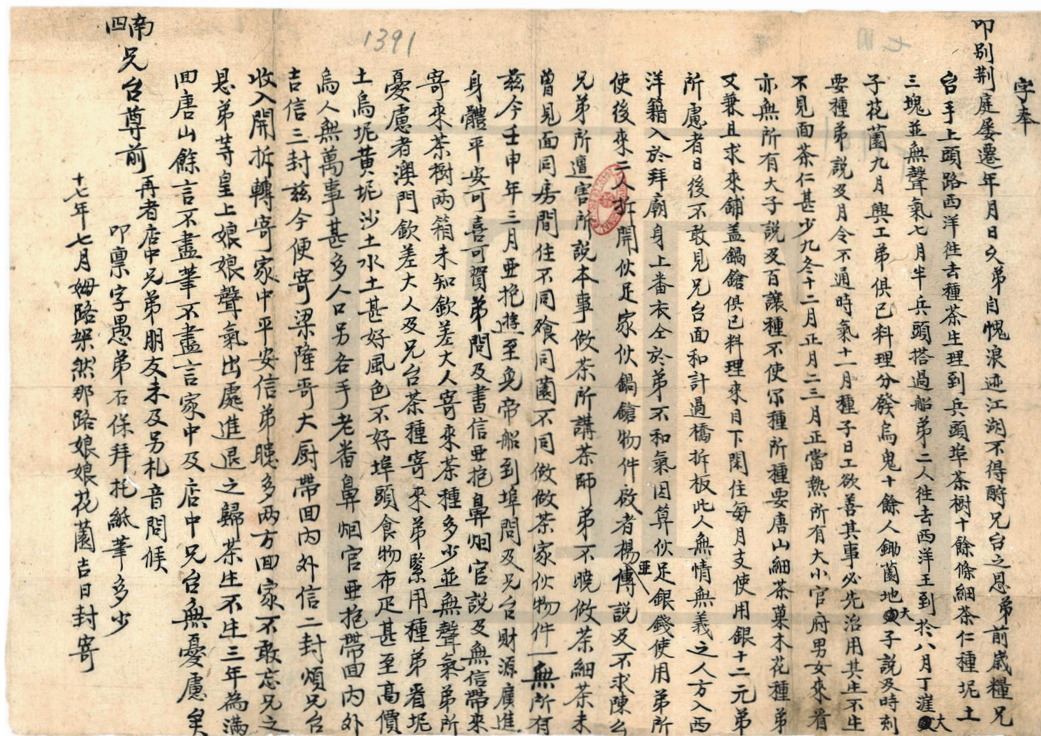
1817年，德国人斯皮克斯(Spix)和马修斯(Maturius)到达巴西，参观了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后来在其《巴西之行》中称：“园中主要种植中国茶树。目前种有六千株茶树，排列成行的茶树每株间距是三英尺(a Três pés)。这里的气候似乎适合茶树生长，茶树于七至九月间开花，种子成熟情况良好。此事说明

〈1〉 《爱国者：文学、政治、贸易报》1813年3月第3期，里约热内卢。转引自[葡]莫拉(Carlos Francisco Moura)《十九世纪上半叶澳门与巴西的关系》，澳门《文化杂志》1995年总第22期，第26—41页。

〈2〉 《华工石保致澳门铺户南兄等叙述在巴西种茶生活情形书信》，前揭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22页。

〈3〉 《华工亚腾等致澳门铺户南兄叙述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情形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书信》，前揭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23页。

〔图7〕华工石保致澳门铺户南兄等叙述在巴西种茶生活情形书信
嘉庆十七年七月初一日（1812年8月7日）
《汉文文书》（Chapas Sincas），T1101
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藏
采自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公开电子资料库



在美洲试种亚洲植物，相同纬度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这里种植、采摘和烘焙茶叶的方法与中国的完全一样。葡萄牙政府特别重视种茶。中国每年向英国出口的茶叶价值达二千万士姑度。前部长利尼亚雷斯伯爵人从中国找来数百名中国种植者，以使人了解种植和焙制茶叶的好处，据说这些中国人不是那些因生活贫困背井离乡流落爪哇及邻近岛屿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利西亚人那样找工作的沿海居民，而是来自中国内地，种茶经验丰富。”^{〔1〕}

该植物园的茶叶一年可采收两次，采摘来的茶叶用陶炉烘干，使叶子卷曲。斯皮克斯和马修斯品尝了该植物园在不同季节采摘制成的不同品种的茶，但香气和口感明显逊于中国本土的茶叶，称：“茶味浓烈，远没有中国上等茶叶的细腻馨香，而是带点苦涩和泥土味。然而这种令人不快的特性并未使参与种茶的任何一人气馁，因为这是茶树尚未适当地种植条件的自然结果。”^{〔2〕}

借着澳门这一中介，巴西引入了中国种茶技术和茶艺文化。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广泛赞誉，茶也成为了巴西最早的“国饮”。唯水土等问题，茶叶质量和产量未如预期，加上到巴西的中国茶农大为减少，执政者亦发现种植及出售咖啡豆、进口外国茶叶更有利可图。清

〔1〕 转引自前揭〔葡〕莫拉(Carlos Francisco Moura)《十九世纪上半叶澳门与巴西的关系》，第26—41页。

〔2〕 转引自前揭〔葡〕莫拉(Carlos Francisco Moura)《十九世纪上半叶澳门与巴西的关系》，第26—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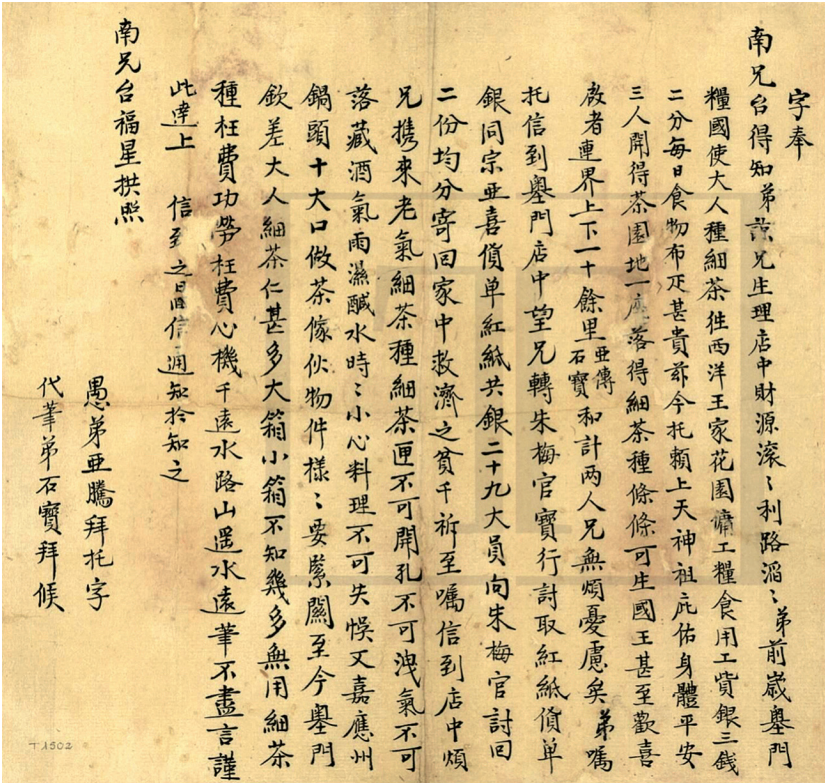
廷官员傅云龙在1889年3月7日至4月5日期间在巴西考察，记述了巴西华人茶工的情况：“泰西语茶曰秭，厥音转自福建，而巴西语茶曰沙，据言传自湖北，时在嘉庆十七年（按：1812年）。嗣是茶植彼土，而焙茶之工，专资湖北之民。今则华工凋谢，三年以前焙茶仅遗八人矣。……初植茶，华工二十余司之。”^①他在巴西时致函总理衙门报告称：“其茶种与制皆借华人力居多，初有千余，余不及三之一，然闻近日又于香港、新嘉坡潜招三船矣。”^②可见当时巴西的中国茶农数量已屈指可数。

巴西的茶叶种植实验虽然不算成功，但葡人并未因此放弃，试图透过澳门把茶叶种植技术传至大西洋。前帝汶总督、澳门警队总司令若阿金·加西亚（António Joaquim Freire Garcia）应朋友若瑟·康托（José do Canto）的请求，1874年在澳门招募了两名中国茶叶专家，从澳门把茶种子及种植技术带到大西洋葡属亚速尔群岛（Azores），种植茶叶。1883年，第一批亚速尔茶正式出售，使19世纪的圣米格尔岛（São Miguel）迅速成为欧洲的一个茶叶生产基地，茶园至今仍在经营。由此可见澳门在中国茶叶种植技术的国际传播的关键角色。

六 结论

早在17世纪初，澳门成为中国面向西方最重要的茶叶转口港，在中国茶叶传播及贸易史上扮演关键角色。澳门对葡语地区的茶叶生产影响尤甚，茶籽、茶叶种植技术等多经过澳门传入巴西和大西洋等

〔图八〕华工亚腾等致澳门舖户南兄叙述在巴西王家花园种茶情形并托带茶种及制茶工具书信
嘉庆十七年（1812）
《汉文文书》（*Chapas Sínicas*），T1502
葡萄牙国立东波塔档案馆藏
采自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公开电子数据库



① （清）傅云龙《游历巴西图经》、《游历巴西图经余记》，《实学丛书》第十五册，光绪二十一年（1895）石印本。
② （清）傅云龙《致译署》，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日，（清）傅云龙著，傅训成整理《傅云龙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82—383页。

〔图九〕19世纪初描金制茶纹游戏盒

澳门博物馆藏

澳门博物馆授权提供使用



化亦从澳门传遍全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出庞大且气象万千的世界茶文化格局，足见澳门对海上茶叶之路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国际化功不可没。

地，对国际茶叶贸易的实务知识和茶文化的传播起重要作用，继而影响国际茶贸易及茶文化的发展走向。

随着广州十三行的出现，闽、浙、江等海关的开通，香港开埠，以及澳门因坚持进口未烘焙的生茶于本地加工导致品质下降等诸多因素，澳门的茶叶贸易口岸的地位虽然在19世纪中叶已大不如前，但粤澳等地生产的与茶文化相关的外销工艺品〔图九〕，亦为18至19世纪产生的强大的“中国热”风潮推波助澜，反映中国茶文化向外辐射的巨大能量，以及澳门在茶文化传播过程中持续数个世纪的作用力。随着茶叶贸易，中国茶文

〔作者单位：澳门艺术博物馆〕

（责任编辑：谭浩源）